

话语功能性与当代中国新话语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300134)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话语功能性的概念,以语言功能的概念为参照,讨论话语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等问题,并结合当代中国新话语的实际,阐释话语的再现功能、构建功能和参与功能。文章指出,当代新话语之“新”不仅在于社会变革中涌现的新词和新语体,而且在于新话语所体现的新的社会行为方式。这些新的行为方式制约着新的话语产生,同时又被新的话语所构建、所催生。

关键词: 话语功能性;新话语;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12)06-0008-04

一、引言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使用各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这使得语言使用者具有“社会人”(Halliday, 2001)的性质,他们有自己的地位和立场,有自己所依托或代表的社会机构和团体;同时,他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不是无所顾及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Foucault, 1984),而是要受到各种社会规约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人”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做事”(Austin, 2002),而且这种“做事”已不局限在“命名”、“命令”这些“言语行为”(Austin, 2002)当中,而是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扩展到“构建身份”和“再现事实”这些社会实践当中。

如此考察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有必要引入“话语(discourse)”的概念。话语不同于语言(language),但是与语言密不可分,这是因为话语比语言包含了更多更广的内涵。例如,教师备课写的教案,是由语言来体现的,包含了词汇、句子、段落,甚至还有图画和图表。仅就这些“客体”而言,“教案”本身毫无疑问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但是,写教案的教师受学校所聘,把教学的过程写成教案。没有学校,没有学校赋予的教学任务,没有学校提供的教学条件,教师就不会去写(或者写不成)教案。将教案和生产教案的这些社会因素融在一起,可以清晰地阐释话语的概念,即:话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同时也包括了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方式的社会规约(田海龙, 2009)。

由此产生的“话语”与“语言”两个概念的区别,使得

在讨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问题时有必要区分“话语功能”与“语言功能”两个概念。广义上讲,如果说语言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那么话语则是人们参与活动、构建身份和再现事实的手段。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语言“工具论”相比,话语的“手段说”还显得有些陌生,需要细致的阐释,这也是本文的首要任务。“语言功能”的概念已经被学者反复定义,正好成为阐释“话语功能”的参照;同时,也需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中话语所发挥的实实在在的作用为例,阐释话语的功能性。

二、语言功能

关于语言功能,Finch(2003)作了微观与宏观的区分。语言的微观功能包括生理功能、寒暄功能、记录功能、区分功能、思维功能、交际功能和愉悦功能,等等。根据Finch(2003)的解释,生理功能指语言可以释放身体中能量、或降低神经的紧张程度的功能;寒暄功能指语言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目的的功能;记录功能指语言可以记录以往发生和今后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功能;区分功能指语言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功能;思维功能指语言可以作为思维工具的功能;交际功能指语言可以用来交流思想和感情、传递信息的功能;愉悦功能指语言可以给人们带来愉快心情的功能。语言的这些功能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直接感受到并可以亲身经历的,田海龙(2009)对此作了示例说明。

语言的宏观功能在Finch(2003)看来是指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提出的语言元功能。韩礼德将语言元功能分为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收稿日期:2012-06-18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语境的本体与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1YJA740081)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田海龙,博士,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话语研究。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概念功能指人们用语言来谈论他们对世界(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经验,用语言来描述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和情形;人际功能指人们用语言来与他人交往,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并用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改变世界;语篇功能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组织信息的方式,表明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人们说话和写作时所处的语境的关系(Halliday, 2000)。

语言的微观功能是一些直接、明显、易被人们认识和认可的语言功能,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个语言元功能则是高度概括的、在众多功能中最为抽象的语言功能;它们是语言所固有的,具有语言的普遍特征。语言功能之所以进入研究的视野,是因为语言研究摆脱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束缚,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语言的运用方面。但是,语言运用所赖以存在的语境在语言功能研究中却只是一个陪衬。微观的语言功能自不待说,高度概括的语言元功能更是如此。

系统功能语言学借助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语域变体(register variables)来研究语言功能(意义潜势),但是语境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说只不过是研究语言功能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而已。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境;因而它是一种以语言结构为导向的功能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语域变体在语言结构中的实现来研究语言结构。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元功能仅是语境中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等语域变体在语言结构中的实现,语言的意义潜势(功能)是根据语境的需要来选择的,它与语境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决定关系。

三、话语功能

以上对语言功能的分析表明,语言元功能较语言微观功能而言更具有理论意义。然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这种理论意义仅表现在语言功能与语境的一种单向联系上面。语言功能仅是语域变体(语境)在语言结构中的实现,对语境没有任何作用。不仅如此,语言元功能的研究虽然也涉及社会语境,但并没有在实质上涉及社会语境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完善语言功能的研究,将研究的重点扩展到社会语境,我们提出“话语功能”的概念。

1. 话语功能的内涵

话语功能(discourse functions)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概念,而是许多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长期关注的课题。例如, Van Leeuwen (1993) 曾经讨论了话语与社会的两种关系: 1) 话语本身就是社会实践(或是其一部分), 话语是行动的一个形式, 是人们对其作用、为其行动或彼此活动的东西; 2) 话语是再现社会实践的一个方法, 是知识的一个形式, 是人们所说的关于社会实践的东西。话语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话语的两个功能: 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 同时, 话语作为知识

的一种形式具有再现社会实践的功能。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话语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 话语参与和再现社会实践的功能也越来越被学者所关注, 对其认识也不断加深。例如, Van Dijk (1997) 把话语作为社会活动来研究, 认为把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研究不仅要对本体和言语进行具体的语言学研究, 而且要注重研究话语在机构、社会团体以及社会文化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这里, Van Dijk 明确提出话语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 尤其是话语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将话语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研究的课题具体到了话语社会功能的研究上。

在此基础上, Fairclough 进一步完善了话语功能的内容。Fairclough (2001) 首先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话语的社会功能, 即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 也是一种再现社会事实的方法。作为社会实践的形式, 话语以语体(genre)的形式表示人们做事的方式, 如商店售货员售货与政治家治理国家都是通过语言来从事社会活动。作为再现社会事实的方法, 话语以具体话语的形式表达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 例如, 由于社会活动的领域不同以及社会活动者所处的地位不同, 穷人和残疾人的生活、政府文件、政党宣言、医学报告和社会科学论文中的再现就彼此不同, 而且这种再现彼此相互引用, 形成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相互再情景化。随后, Fairclough (2003) 将话语的社会功能由两个扩展到三个, 在认为话语具有参与和再现功能的同时还具有构建功能, 即话语可以用来构建个人风格。作为构建个人风格的方法, 话语以文体(style)的形式表现社会活动者的个人风格。例如, 一个公司的经理可以运用语言构建自己或诙谐或严肃的做事风格。

至此, 话语功能被具体表述为参与、再现和构建三种功能。话语可以被社会活动者用来参与社会实践, 再现社会实践和社会事实, 以及构建社会事物、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者的特征。但是, 对话语功能的分别论述并不等于话语功能是分别实施的。一种话语功能的实施可能包含着另一种话语功能的实施。因此, 对话语功能的认识应该是开放式的, 强调其多元性和不确定性, 不可将话语与社会的关系视作固定不变、封闭静止的联系。

2. 话语功能的特征

讨论语言功能的前提是语言运用, 而讨论语言功能时所涉及的语言运用环境(语境)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语境, 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朗, 所涉及的因素比较直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 由于元语言功能的高度概括性, 被实现在语言结构中的语域变体(语场、语旨和语式)也是抽象化(而非具体的)语境因素。与之不同, 话语功能是语言在大的社会语境中的运用, 这种社会语境是权力关系和社团利益集中作用的场所。这构成话语功能的一个明显特征。

社会语境包括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机构语境”以及与

社团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而话语的功能在本质特征上就是话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因此，话语在社会语境中的运用更多地体现出交际双方的权力关系和彼此的意识形态。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语言使用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同一社会事实再现或建构时所采用的语言策略是不同的，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要考虑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否则所称的社会语境就会混同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意义上的社会语境，甚至混同于语言事件发生的场景；这样的社会语境对话语而言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更无从论及话语的社会功能。所以，认识话语功能的本质特征，需要考虑社会语境如何影响话语社会功能的实施。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话语功能就是话语在机构语境和社团语境中所实现的话语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件和构建社会关系的功能。

话语功能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建构性；这也是话语功能区别于语言功能的一个特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功能是语域变体在语言结构中的实现，与语境的关系是语境决定语言功能这种单向的关系。与此不同，话语功能强调话语对语境的建构。换言之，话语功能体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者通过话语对权力关系的重新建构，对事实的重新再现，对社会实践的重新参与。所以，研究话语功能不仅要关注社会语境中的权力关系和社团利益对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关注与话语功能相关的社会因素，更重要的是认识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制约的。话语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是由社会实践者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语言成分主动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即是话语与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换言之，话语的生产和消费不仅受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且反过来也形成新的权力关系，构成新的意识形态。

3. 话语功能的实施

话语之所以在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实现其参与、构建和再现的功能，是因为有社会实践的主体通过选择一定的语言手段和语言策略体现机构的权力关系和实现社团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功能的实施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交流对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机构选择使用语言的过程。就语言选择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一个是选择的对象，一个是选择的主动性。

就选择的对象而言，话语功能不是靠选择语法规则来实施，而是要选择话语策略。固然，话语功能的实施可以通过选择词汇、话步、语体和模式，但在本质上是要选择话语策略，如替换策略、增减策略、重复策略、正当性策略，强化策略、淡化策略、提名策略、所知策略，等等 (Reisigl & Wodak, 2001)。

语言选择的主动性对话语功能的实施非常重要。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涉及语言选择的问题，而且认为研究语言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的问题 (Thompson, 1996)，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忽略了语言使用

者在语言选择中的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在语言交际中选择什么语言或语言变体完全由语境决定，人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选择。这种认为语境而非主观意识是语言选择的决定因素观点，排除了语言使用者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是无济于话语功能实施的。

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具有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事实和构建社会关系等社会功能。话语这些功能的实施离不开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就是说，离不开生产这些话语的社会生活中的“人 (agent)”。社会实践的主体可以以具体的人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主体一定是机构语境中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主体，一定是社团语境中代表一定社团利益的主体。这些社会实践的主体，通过主动地、有意识地选择语言，如选择语音、语法 / 结构、词汇，选择语体、语步，选择需要转换的语码，甚至选择文本及文本的编排，来实现自身参与社会实践、构建自身社会关系的目的，实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再现社会事实的愿望。

四、当代中国新话语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如下岗女工、农民工）和社会现象（如农村城镇化）不断出现，新的行为方式（如网购、团购）和管理模式（如基于网络的财务管理）不断涌向。一方面这些变化在语言层面留下痕迹，促使新的表达形式和新的词汇不断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如“淘宝体”以及类似“hold 住”这样的新词）；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如 Web 2.0 技术）传播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新的社会现象，规范新的行为方式。例如，游客借助网络发布旅游感受，评论旅游服务的质量，构建出与官方不同的旅游质量，引导新的旅游倾向（田海龙等，2012）。

面对社会变革中的新话语，我们会问它新在何处？基于本文对话语的认识，在话语是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层面，当代中国新话语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和词汇是新的；在话语是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和规约这个层面，这些新话语在本质上则是以新的表达方式代表和体现着与语言运用相关的新的社会规约和行为方式。这些规约和行为方式制约着新的话语产生，同时又被新的话语所构建、所催生。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功能性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新话语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用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来说明新话语和话语功能性的问题。

2011 年 8 月 7 日，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有 90% 的山西醋是勾兑的，而不是酿造的。报道称，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在接受采访时说，市场上出售的酿造的山西醋不超过 5%。由于用冰醋酸或者醋精勾兑不需要发酵，只要一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完成生产过程，而酿造的山西醋需要经过 28 天的

发酵期，之后还要沉淀两三个月甚至一年，所以勾兑的醋在质量上比酿造的醋要差许多，其营养成分也不及酿造的山西醋。可想而知，山西醋业协会副会长爆出的这个内幕会给山西醋的品牌造成很大的伤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山西醋的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山西醋产业协会发表了声明，称山西所产的山西老陈醋、山西陈醋全部是纯粮酿造，根本不存在醋精勾兑；山西食醋企业全部能按标准组织生产，不存在多加防腐剂的情况；因王建忠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协会的声誉，严重侵犯了山西省食醋生产企业的名誉，协会保留对其提起诉讼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山西醋产业协会会长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协会方面已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长之职。

山西醋的这个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与话语紧密相关。首先，说山西醋大部分是勾兑的，使用的是话语；说山西醋是酿造的，使用的也是话语。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构建出不同的山西醋生产的过程，也构建出山西醋不同的品质。这个事件告诉人们山西醋的生产方式可以由话语建构的。其次，这种话语对山西醋的构建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话语对山西醋的再现。如果山西醋的品质只有一个，或者勾兑，或者酿造，那么这两种话语对山西醋的再现可能会出于不同的利益，或者是不同的认识。一般来讲，山西醋好的口感和味道可以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怎么产生的却是一个谜团。一方说是勾兑的，另一方说是酿造的，普通消费者对于这个生产过程是无从了解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通过话语建构的一种生产方式。那么，哪种话语建构的生产方式是真实的呢？对此，普通消费者不可能有答案；他们只知道，说山西醋是勾兑的那个副会长被解职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他所说的就不是事实呢？对此，普通消费者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因为，在这两个话语的交锋过程中，取胜的一方一定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取胜与否，与真实性的关系没有比与权力的关系更紧密。这两种话语，勾兑话语和酿造话语，再现了不同的山西醋的品质。这种不同再现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对立的话语是双方参与社会活动的手段，是社会人参与社会活动、实现其目的所必须利用的手段。或曰：话语参与社会活动的功能。

在山西醋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话语的作用：它再现了山西醋的品质，构建了山西醋的生产方式，参与了相互竞争的活动。所有这些再现、构建和参与离开话语是不能实施的。话语功能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如此明显和重大，与这个事件的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是分不开的。而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新媒体技术参与话语功能实施的一个特点。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新的传播技术做媒介，那个副会长或许也不会借用话语来再现酿造的山西醋不超过5%，因为造不成更大的影响。因此，也不会有接下来的话语交锋，以及机构话语的胜利。可见，新话语之所以“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话语与新媒体融合在一起，加之权力运作其中，形成了话语的参

与、再现和构建功能。

五、结语

在当今社会，有两个词可以说脍炙人口，一个是“话语”，一个是“全球化”。话语体现着语言运用中扯不断、拆不开的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人和他所代表的机构、社会人之间的等级关系、社会人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等等。全球化体现着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跨国境和跨地区的变化，也包括话语方面的变化（Fairclough, 2006）。如果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那么就要考虑二者的关系，社会的变化导致话语的变化，话语的变化促进社会的变化。在这种辩证的关系中，新的媒体技术就像一种催化剂，使得话语的作用更明显、更突出。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在人们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同时，话语的社会功能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200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 Finch, G. 2003. *Linguistics: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Language*. Hampshire: Palgrave.
- [3] Foucault, M. 1984. The Order of Discourse[A]. In M. Shapiro (ed.). 1984. *Language and Politics*[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108-138.
- [4] Fairclough, N.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Wetherell, M., Taylor, S. and Yates, S. (eds.). 2001. *Discourse as Data*[C].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p.229-266
- [5]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6]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7] Halliday, M. A. K.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 [8] Halliday, M. A. K. 2001.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 [9] Reisigl, M. &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0] Thompson, G. 1996.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Arnold.
- [11] van Dijk, T. A. 1997. *Discourse as Interaction in Society*[A]. In van Dijk, T. (ed.) 1997.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37.
- [12] van Leeuwen, T. 1993. Genre and Field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Discourse & Society* 4(2):193-223.

(下转第22页)

- [9] 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连树声 (译) [M]. 原始文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 [10] 曹顺庆.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23-130.
- [11] 陈明, 周瑾. 范式转换: 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1), 56-65.
- [12] 陈平. 引进、结合、创新. 当代语用学, 2006(2).
- [13]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施旭. 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 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31-40.
- [15] 施旭. 文化话语研究: 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6] 施旭. 构建中华话语研究体系. 丁建新、廖益清 (主编) [M]. 批评语言学.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17] 石毓智. 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18]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4.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rse from a Typological Point of View

Yu Sheng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arguing that linguistic typology is a major determinant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discourse and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paradigm of discourse, which reflects and is reflected by, constructs and is constructed by the culture within the language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unique Chinese typology requires a unique system and paradigm of discourse for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necessitated, on the one hand, by the present need to build us a cultural power, and is a pathway, on the other, for studying and disseminating culture that is essentially not self-evident.

Key words: culture; discourse; linguistic typology;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on Chinese Culture

(上接第 11 页)

[13]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2009.

[14] 田海龙. 旅游话语研究.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2.

Discourse Functionality and New Dis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ian Hai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aises the issue of discourse functionality and, starting from language function,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nd the features of discourse functions. The paper illustrates further how discourse represents, construct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social event. It points out that new discourses are new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new words and new styles of speaking, but also the way of representing, constructing and doing involved in the new discourses.

Key words: discourse functionality; new discourse; social change